

The Making of a World Leader

〔英〕 菲利普·斯蒂芬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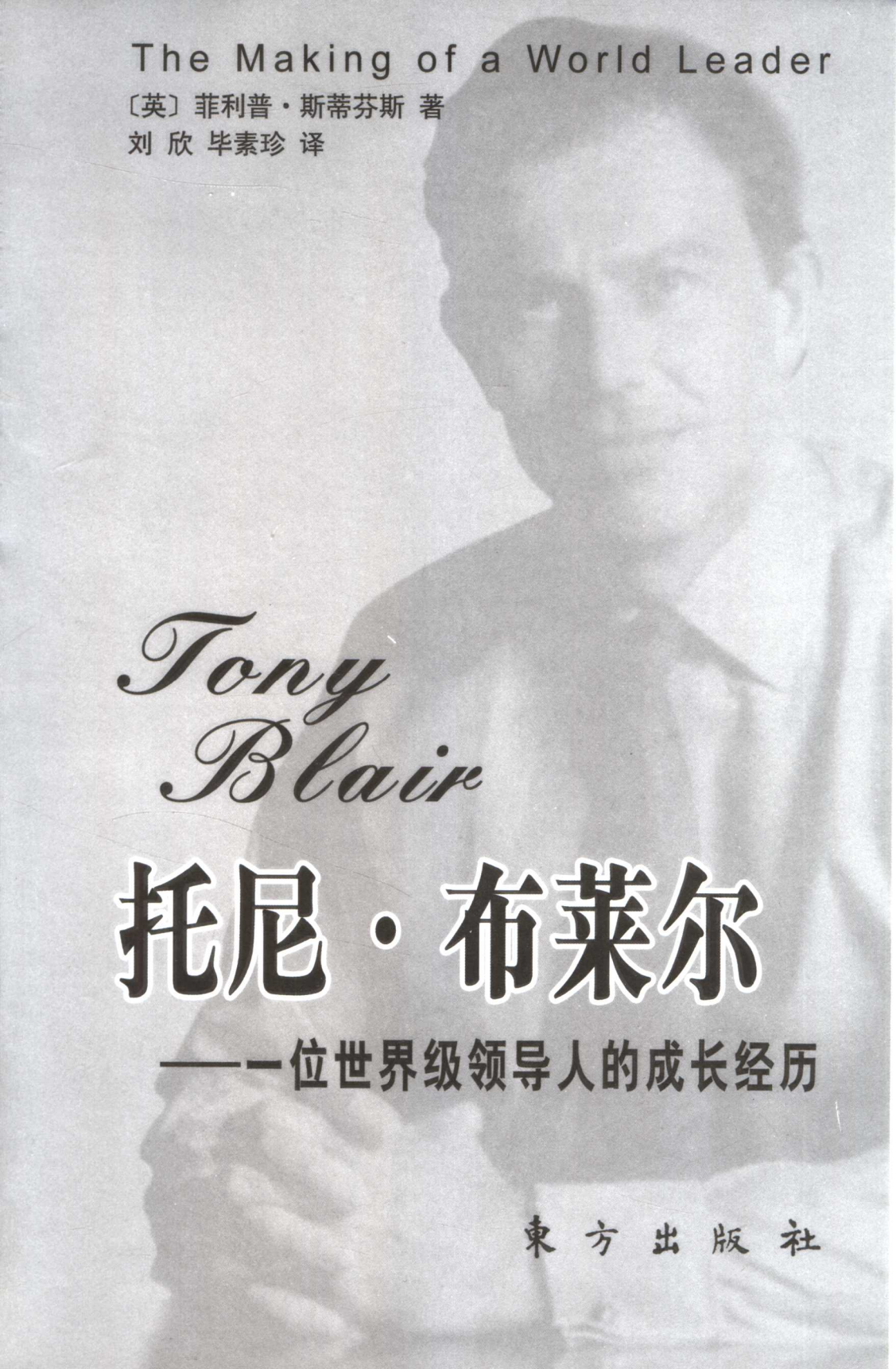
刘欣 毕素珍 译

*Tony
Blair*

托尼·布莱尔

——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

东方出版社



The Making of a World Leader

〔英〕 菲利普·斯蒂芬斯 著

刘欣 毕素珍 译

*Tony
Blair*

托尼·布莱尔

——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杨松岩

责任编辑 侯俊智 刘 佳

装帧设计 肖 辉

责任校对 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尼·布莱尔——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

[英]菲利普·斯蒂芬斯著 刘欣 毕素珍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60-2504-3

I. 托… II. ①斯…②刘…③毕… III. 布莱尔-传记

IV. K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33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029 号

Copyright © Philip Stephe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hilip Stephens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书 名 托尼·布莱尔——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

TUO NI BU LAI ER

作 者 [英]菲利普·斯蒂芬斯著 刘欣 毕素珍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0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0-2504-3/K

邮购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定 价 26.00 元

导言

2003年3月18日,英国议会下院里群情激愤。这个立法机构里的绿皮长凳上坐满了人。托尼·布莱尔准备让英国参加乔治·W. 布什发动的对伊战争。几个星期前首相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这让他感到惶惑、疲倦和沮丧,但是他已经决定要这么做。然而英国民众的情绪却是反对牺牲战士的性命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统治。在他偏左的工党内部,人们对于白宫共和党总统的强烈反感与对战争合理性的怀疑交织在了一起。即使在英国军队已集结在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地带时,布莱尔所面对的依然是曾经的支持者对他日益加深的反抗情绪。布莱尔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前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已经辞职了。其他部长也准备辞职。许多工党议员打算要对自己的政府投反对票。除威斯敏斯特之外,曾经和欧洲重要盟友的友好关系也都土崩瓦解。

布莱尔无动于衷。用他重复多次的话来说,结束萨达姆对于国际社会的对抗是“正确的事”。这就是他的决定,他告诉内阁的幕僚们,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政府官员已经准备了应急预案,惟恐点票后他被迫辞职。在3月投票日的早上,首相充满信心将会获得多数票的支持,因为反对党保守党曾经支持过推翻巴格达政权的战争。但是,他面临的危险却是一半以上的自己的支持者都将倒戈。这种情况下,他将难保首相之位。英国和世界对这位领导人可能还不够熟悉。布莱尔已经扭转了工党的命运,并多次证明自



托尼·布莱尔

己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这就是信心政治。

他要失去所有。六年前,就在他 44 岁生日的前几天,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成为了自 19 世纪早期的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三年后,他成为 150 年来第一位在唐宁街 10 号做父亲的首相。2001 年 6 月他在大选中再次以多数票获胜,这几乎确保了他成为英国历史上任首相时间最长的工党领袖。除此以外,他还改变了英国政坛的面貌,将工党从荒芜的社会主义左翼带进了富饶的中间地带,并改头换面成为“新工党”。他一方面借鉴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的政见及竞选技巧,一方面摒除旧意识形态中的左派、右派之分。他认为这种区分属于柏林墙倒塌前的那个时代。他信奉进步政治的观点,废除了神圣的社会主义信条,就是这些信条束缚了工党,使它近二十年无缘组阁。多数政治家都是以传统政治立场为出发点的,但布莱尔却从他的基督信仰中吸取价值观作为理论出发点。他所尊崇的政治英雄是 19 世纪统治英国的中间自由党的领导者,而不是他现在所领导的工党运动的权贵们。他是保守党律师的儿子,接受过高等私人教育,因此他总是与自己的党有些距离。让他的许多同僚们感到不舒服的是,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位民族领袖,不代表哪个党,虽然他成功地将主宰英国政坛数十年的保守党赶下了台。但是,随着英国部队进驻到科威特的“启动线”,所有这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了。

在关键辩论之前的日子里,首相的姿态一直是坚持要求对萨达姆采取强制行动令其遵守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时通过的联合国决议。他的讲话和访谈在国外引起共鸣。9·11 恐怖主义袭击后他和乔治·W. 布什建立的紧密关系成为了西方反对新威胁的支点,这种对国家安全的新威胁来自所谓的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长。但是首相和总统的这种关系本身充满了困惑和矛

盾。布莱尔是中间偏左派,他仍然认为比尔·克林顿是他最亲近的政治盟友和伙伴。首相曾经说过克林顿是他曾见过的最出色的政治家——这一评价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布什是得克萨斯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欧洲中间偏左派的领导人都很蔑视他而且有时很讨厌他。整个伊拉克危机期间,布莱尔都征求克林顿的个人意见。最近,在下院投票的那个早上,克林顿也被召集来帮助他的老友。这位前总统在写给《卫报》这份工党议员常读的报纸中敦促大家要支持他们的领袖。“相信托尼的判断”这是标题所宣扬的。3月的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好像布什、布莱尔和克林顿是并肩站在一起的。

首相对于他与布什的关系从来不觉有丝毫歉意,他的想法是为了国家重要的战略利益,不管白宫的主人是谁,他都要和华盛顿搞好关系。他把英国的角色看作是一个“中枢”力量,他是1945年以后维持和平的欧洲与美国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枢纽。他与美国总统有着同样的对21世纪安全新威胁的担心——这方面他比其他欧洲领导人更甚一层。2001年9月11日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轰然倒塌的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塔暴露了极度危险的威胁,这种威胁只有军事行动才能予以清除。而对抗这种威胁美国 and 欧洲必须站在一起。首相总是说纽约的袭击已经“改变了美国的心理”,尽管“它应该改变整个世界的心理”。虽然冷战的结束使得大西洋联盟在一段时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布莱尔相信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萨达姆的挑衅以及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失败国家和问题国家使得重建这种联盟变得很有必要。与共和党总统交好是性情所致也是现实政治问题。尽管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创造了中间偏左派的“第三条道路”的运动,但布莱尔绝不是一个部落首领。在欧洲他和西班牙的中间偏右派的首相何赛·玛丽亚·阿斯纳尔更为



托尼·布莱尔

密切，而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利奥内尔·若斯潘却很难达成一致。

但是托尼·布莱尔的对伊战争在很多方面是与乔治·W. 布什的战争相左的。除了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势力这一共同目标，华盛顿和伦敦似乎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设计。美国政府的动机好像是驱除反对的敌人——向世界显示美国将会动用所有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美国要重申自己的首要地位，要扮演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角色。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和五角大楼的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完全不屑于在唐宁街讨论美欧合作的军事秩序。布莱尔要的正是建立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尽管他自然地倾向于大西洋主义，但他却是个多边主义者——他坚信西方世界的安全依赖于有效的国际合作。他分析认为9·11事件是一场悲剧，它说明了现代世界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即使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面对来自国外的安全威胁。布莱尔同样相信“民族建设”，相信西方世界创造和保卫和平甚至在必要的时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这方面他与保罗·沃尔夫威兹这样的美国新保守派有着相同的认识，但与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者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却没有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支持布什总统对伊战争的要求是美国给予联合国最后一次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机会。每次与总统会面他都要求的第二个保证是美国须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他无数次对布什说只有中东地区达成一个长久和平的协定，才能真正避免恐怖主义。

托尼·布莱尔出任首相的早期就显示出这样的对外政策。他的对外政策根植于19世纪英国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所宣扬的干涉主义。和这位著名的先驱一样，他不能接受所谓的战略原则，即除非自身的国家利益濒临险境，否则政府不可以干预世界事务中的专制和不公正现象。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深信不

疑的基督教义——都告诉他文明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与国门之外的苦难作斗争；长远来看，这样的干涉实际上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早在 9·11 事件发生前，布莱尔就已经公开坚持采取军事行动来完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的专制统治，并且他还派兵前往西非国家塞拉里昂结束内战。1999 年春天，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他阐述了一项新的“国际社会准则”。他宣称专制者决不可再以联合国宪章为掩护寻求对自己民族的压迫。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是“一场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而不是领土争端基础上的正义战争”。但是这也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战争：“如果我们让一个邪恶的暴君无所顾忌地横行霸道，我们以后就注定要流更多的血、耗费更多的财物来阻止他。”

尽管托尼·布莱尔有这样的理想主义，但他却拥有这一职业所带有的缺陷。没有人批评过他缺乏个人野心。而且，尽管在政治上他更喜欢交友而不是树敌，他却从来没有缺乏过政治家登上政治顶峰所必须具备的冷酷无情。布莱尔内阁中的一位朋友兼崇拜者说：“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冷酷无情的领导者。做残酷的事情时他从不多愁善感。”政治信息中充满基督信仰的道德高调与布莱尔用以赢得和保持权力的低调政见经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坚定经常与处理国内事务上的胆怯和犹豫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反对党领袖时，布莱尔打碎了对于英国战后政治的推测，以他的形象重塑工党。他将自己置于保守党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工党极左派领导人之间。他说老左派强调社会权利而排除个人义务，而撒切尔主义强调个人经济权利却排除社会责任。新工党将权利和义务合二为一。但是有时布莱尔对内政策的主要目的看起来更像是仅仅为了赢得大选。最初他总是受到从比尔·克林顿政府引入的焦点小组和民意测验的限制。他有着过人的政治技



托尼·布莱尔

巧,他是英国政界讲话最流利最有说服力的交流者,但是他在掌控笨重的国家机器方面的能力却与此不相匹配。而他雄辩的天赋是建立在坚定的自我信念基础上的。在北爱尔兰,当长达六年的耐心的和平努力化作一场针对英国国家的暴力冲突时,布莱尔展现了他的天才,说服了不理智的人民做出理智的事情来,取得了出色的结果。还有的时候,他似乎认为煽动人心的雄辩能力可以将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不只一次地认识到远见并不能替代在位者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

尽管有这样的缺陷,9·11 事件及伊拉克冲突后的事态发展使大家看到了一个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托尼·布莱尔。有才能的演员与有信念的政治家结合到了一起。在美国遭受袭击后的几个月,他行程数万英里,会见了数十位世界领导人,用自己的雄辩才能去争取一个联盟,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不管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用的最好方法是对是错,他的方式是有着原则根基的,也是用勇气来执行的。这是个人的分水岭,也是政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告诉英国也告诉世界这位首相是一位什么样的政治家,他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对于他为何加入对伊战争有很多解释,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现实政治是首要的原因。而且毫无疑问战略利益问题也起了关键作用。但是推动布莱尔冒险走向战争的是一种信念,即消除萨达姆·侯赛因世界会变得更好。如果这种摩尼教的观点甚至让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感到不安,那么这种愿意赌上一切的做法更使他迥异于其他领导者——他在政治上愿意去改变。他对于这种冒险会毁了他政治生涯的看法充满乐观,因为他觉得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能做他认为正确的事,那么坐这个位子没有任何意义。讽刺的是,对伊战争之后人们对于萨达姆是否藏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产生了狂热的争论,而布莱尔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以另一种思维去发动这场战争的。对他来说,消灭一个危险的残暴的独裁者是一个紧迫的道德事业,其紧迫性不亚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莱尔的基督信仰要求思想开明,能够容忍人类的弱点并尊重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基督教——以及他从基督教中得出的世界是由相互依赖的个人和团体所组成的观点——激活并渗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

托尼·布莱尔对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受到袭击所做出的反应,使这位本已在国内受欢迎又蜚声欧洲的政治家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一名领导人物。他对乔治·W. 布什的支持包括先反对恐怖主义继而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统治,这种支持使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超过了多数战后英国首相。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美国人中获得承认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可以证明,在使英国成为美国坚强盟友这件事上,布莱尔甚至比“铁娘子”做的还多。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却严重地削弱了他在国内的声望和支持率。

首相在 2003 年 3 月 18 日赢得了战争投票的胜利。尽管有 139 名,或者说三分之一的工党下院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布莱尔还是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党内人士的支持。10 天后,当英美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面的时候,乔治·W. 布什给出了现在已非常著名的颂词:“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对托尼·布莱尔有了更深的了解,”总统说,“我们了解了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们为有他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和平要比战争带来的问题更多。

几个月后,在 8 月初,布莱尔成功连任,这使得他的政府成为



托尼·布莱尔

工党历史上当政时间最长的政府。虽然英国现在有了一位改变了英国政坛气候,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出色领导人的首相,但大众的心里却并不是充满感激的。对伊战争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一个血腥又混乱的局面。战争后数月寻找不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大众产生了对布莱尔的信任危机。同样,公众对于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夸大伊拉克领导的威胁充满了争议。在坚定的表示要与美国并肩战斗的时候,布莱尔强调最多的是即将面临的危险。2003年夏天,针对著名武器专家自杀的公众调查揭示了作为战争理由的情报报告存在问题,布莱尔政府曾有意夸大这种潜在的威胁。许多人质疑布莱尔,认为他为了与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而忽略其他判断。也许,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被选举出局时所认识到的那样:英国首相的命运就是在国外受爱戴,在国内却遭怀疑。当他在2003年7月底接受采访回顾这一切时,托尼·布莱尔身体里的那种19世纪传道士的声音如当初一样清晰:推翻萨达姆是“一件正确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托尼·布莱尔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是工党的财政发言人助理,我是《金融时报》的经济记者。接着,我从一名报纸的政治版编辑成为了一名专栏作家,又成为联合王国的编辑。我在无数场合与他交谈过,也采访过他,看着也记录着这位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崛起,从他最初成为工党领袖,继而当选英国首相,最终决意对英国以外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许多次会面的记录都以采访稿的形式发表在了《金融时报》上;还有一些成为了报纸专栏的素材。写这部传记,我使用了很多与他交谈的内容,也包括了许多与他的朋友、政治盟友和助手以及他的政治对手的对话。2003年7月底,布莱尔特别答应为这本书接

受了一次长长的公开发表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坦率地谈到他的政治生活所受的早期影响,他对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以及对伊战争的看法。

托尼·布莱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英国国内和国外的成就证明他并非年轻和经验不足。他是一名为了信念愿意冒险的领袖。但这是一部传记而不是圣徒传。布莱尔的崇拜者们经常为他采取的无情的政治手段感到遗憾,这种不犯规又不光明的手段总是与他宣扬的信念同时存在;布莱尔的批评家们又总是被他为追求公众称赞而推出的原则所解除武装,消除敌意。我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肖像,由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



尖塔和塔尖	001
信仰和家庭	015
局外人	037
新民主主义者,新工党	057
一个新国家	079
世界舞台	101
寻找第三条道路	119
创造和平	135
发动战争	149
事件	165
交友	181
正确的事	203

1 尖塔和塔尖

布莱尔是背负着母亲的劝谏走入政治生活的。这位年轻的政客作为“现代化改革者”跻身于工党，是一位急于废除过去一切的领袖。

托尼·布莱尔的成长道路经历了英国历史的几个重要时期。这位未来首相的早年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古老的钟塔还有中世纪的四方形建筑，这些地方都是英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玩耍嬉戏的场所。附属于达拉姆市古老教堂的克利斯特学校是他进入苏格兰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非特斯公学的进级之阶。从非斯特出发，这条路又通向了世人向往的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接着他又进入了伦敦法学院开始了一个年轻人的法律道路，伦敦的法学院是英国法律机构中戴假发、穿长袍传统的发源地。当1983年布莱尔最终以议员身份进入威斯敏斯特宫时，这个国家民主中心的哥特式辉煌看起来与他年轻时生活过的修道院地区是如此相似。

但就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他的行程转了向。他早期生活中的那些令人敬畏的机构是一条通往英国政治中右派保守党的传统道路。如果布莱尔在保守党平步青云，没有人会感到惊讶。毕竟，他的父亲里奥在患病之前一直怀抱成为托利党（保守党）议员的愿望。但是他的儿子选择了向左走，选择了工党，而且就在他



托尼·布莱尔

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

加入的时候，工党已显出无情的衰退迹象。年轻布莱尔政治前景的根基、他的道德信仰以及他身上所具有的能够让他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名非凡演员的国际性特质就这样被放置在了他幼年时期那些辉煌建筑的外围：他的基督信仰、家庭悲剧的经历、另一个年代给予他的价值观、无法动摇的自我信仰、政治、个人追求。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布莱尔多次提醒人们他成为一名工党政治家是一种选择。其他人是出生在左派家庭，他们的信仰要么是被家庭传统熏陶而成，要么是被剥夺了童年，或者是完全出于阶级忠诚。托尼·布莱尔则不同。即便作为工党领袖和首相，他都与他的党保持着一定距离。

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于1953年5月6日出生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他的父亲里奥是一名大学法律讲师，由于父亲职业的关系，在孩子们小时候这个家庭来到了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小布莱尔五岁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英格兰，这时里奥边教书边做律师，职业前景非常不错。他们的家就在达拉姆市的东北，这个城市享受着现代繁荣也有着光辉的过去。这里是著名学府的所在地，在这里里奥通过出任英格兰北部巡回法庭的初级法庭律师事业发展得很兴旺。小托尼在三个孩子里排行第二，他享受着舒适的特权生活。他的父亲不能说是很富有，但也足够有实力让小布莱尔跳出国立学校系统，接受私人教育。里奥是一个自己创造命运的人。他自己雄心勃勃，对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同样充满了希望。

富裕的生活来之不易。里奥·布莱尔的父母是为音乐厅演出的流浪艺人，里奥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寄养在一个格拉斯哥的家庭中。他和亲生父母惟一的联系就是儿子托尼中间的名字“林顿”和“查尔斯”是来自亲生父亲，“林顿”是他父亲的真名，“查

尔斯”是艺名。里奥通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逃出他童年严酷的寄养环境。战争开始前他在14岁的时候就被迫离开学校，当上了一名小职员，但参军后他升得很快，迅速从低级兵士成为了一名军官。战争结束后他重新接受全日制教育并最终获得了在律界的发展机会。像所有他这一代艰苦奋斗的人一样，他决意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他的政治信仰也发生了改变。还是生活在贫苦环境的少年时，他随便就选择了极左派；但做军官并要有自己的事业后，他决定加入保守党。

托尼的母亲黑兹尔却是另一种性格。里奥是充满雄心壮志又喜欢社交，而她却是非常贤淑和安静。她出生于爱尔兰，用她儿子的描述就是“出生于她祖母在多内加尔巴里香依大街的五金店上面的公寓里。”父亲去世后她来到了格拉斯哥，在这里她认识了里奥并与他结婚。这个家庭一直与爱尔兰保持着联系。托尼·布莱尔成为首相后第一次向爱尔兰议会致词时，他甜蜜地回忆起他还是个小学生时，在多内加尔度过的每一个暑假：“我是在爱尔兰海岸学会的游泳，就在多内加尔父亲第一次带我去酒吧喝酒，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乡下的偏远的小屋。”黑兹尔没有像她丈夫那样的野心，她负责照看家和养育孩子们。她“非常害羞”，多年后她的儿子这样评价她。“她一点恶意都没有。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在丈夫中风、最小的女儿萨拉患病时都是她引领着这个家渡过难关。在八岁的时候萨拉患上了斯蒂尔病，这是一种风湿性关节炎。黑兹尔从服侍丈夫又换作照顾女儿。萨拉的病需要集中治疗，需要有人长时间在医院陪护，药物治疗还带来很多副作用，但萨拉终于康复了。

达拉姆克利斯特学校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初是为市里老教堂唱诗班的男孩子们提供教育，在托尼八岁的时候他跟随哥



托尼·布莱尔

一位世界领袖的童年生活

哥的脚步也进入了这所学校。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这个教堂学校的各种传统依然存在,但是它的领域扩大了,成为了精英类的预备学校的一员,只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在这里接受正规教育。后来首相在回忆这时的经历时总是说这段时间和教育的重点就是培养良好的品行,这种价值观又被父母反复加强。布莱尔在报纸采访中记起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他人,懂礼貌,为老人让座,说‘请’,然后就是‘谢谢’。”他记得在学校受了批评后,母亲总会代表他向老师道歉。布莱尔是背负着母亲的劝谏走入政治生活的。这位年轻的政客作为“现代化改革者”跻身于工党,是一位急于废除过去一切的领袖。但是他的举止态度却让人想起温文尔雅的时代,就像讲究礼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管布莱尔有什么样的过错,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们很少听到他因为生气而提高嗓门,对于别人的善意或礼节,他总是马上表达谢意。

布莱尔 13 岁时进入了菲特斯公学,这段求学时光并不愉快。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这所苏格兰最负盛名的公学,一方面是要说明他的根在苏格兰,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社会意图的显现。在一个通过艰苦努力而取得成功的父亲心中,托尼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是一定要进入到英国上层社会的。菲特斯公学建立于 1870 年,是一所苏格兰富商子弟的寄宿制学校。它坐落于爱丁堡一隅,建筑样式融合了苏格兰宏大的风格和法国的哥特式风格。学校建立的初衷是培养有学识的年轻人,让他们走向世界去争取国家商业利益,为大英帝国服务。建立之初它就遵从所有公学的共同宗旨:用严格的纪律和简朴的生活培养富家子弟的“性格”。这就是托马斯·休斯在他 1857 年所著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中所描绘的世界:严酷,且往往故意很残酷。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所学校想要服务的大英帝国已经消亡